

资本主义批判的世界视域与落后国家的解放之路

田世锭,徐艳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马克思是基于世界视域批判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的解放内在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能够同时取得胜利,致使落后国家没有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是陷入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困境。全球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是落后国家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世界视域;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全球劳动力套利;落后国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2-0035-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2.004

The World Vision of the Capitalism Critique and the Road to the Liberation of Backward Countries  
Tian Shiding, Xu Yanhua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It's based on the world vision that Marx criticizes capitalism. The lib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ackward countries respectively internalizes in the logic of the capitalism critique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apitalism. That the victor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has not been achieved simultaneously has led to the failure in backward countries in leaping over the Caudine Valley of capitalism, which has brought the dual dilemma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t is the only way for backward countries to realize liberation by uniting the global proletariat to occupy and utilize all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f capitalism.  
**Key words:** Marx; capitalism critique; world vision; the Caudine Valley of capitalism; the arbitrage of global labors; backward countries

马克思反对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sup>[1](P720)</sup>以及关于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论述<sup>[1](P828)</sup>,引发该领域长期的学术论争。一种颇有影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基于西欧视域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因此,至少还存在一条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平行抑或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俄国式的东方发展道路。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北方资本凭借“民族压迫”“全球劳动力套利”等掠夺南

收稿日期:2023-0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KS160)  
作者简介:田世锭(1967—),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徐艳华(1997—),女,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方活劳动的全球化时代<sup>[2]</sup>,有必要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视域与落后国家的解放之路进行再思考。

## 一、资本主义批判的世界视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3](P404)</sup>。这正如因坦·苏万迪(Intan Suwandi)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在规模上则是全球化的<sup>[4]</sup>。这种帝国主义的全球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促使人们建立普遍交往。正是基于这种普遍交往,首先,个人得以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sup>[3](P166)</sup>;其次,一个真正与整个旧世界相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没有民族独特性而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同样利益的无产阶级得以形成<sup>[3](P195)</sup>;最后,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因而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实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断言,“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sup>[3](P166-167)</sup>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它们都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历史性而不是西欧式的视域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因此,恰如露西娅·普拉德拉(Lucia Pradella)所说,“马克思的笔记和文章证明,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不是将英国资本主义作为民族体系,而是将其作为殖民体系来加以考察的。”<sup>[5]</sup>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批判的世界视域决定了落后国家的解放不可能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批判逻辑的,落后国家的发展也

不可能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

一方面,落后国家的解放内在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sup>[3](P861)</sup>换句话说,印度人民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放并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马克思认为,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一个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的农业区<sup>[6]</sup>,并在《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中指出,“除了或者英国自愿给爱尔兰以自由,或者作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sup>[7]</sup>。这表明了诸如(当时的)印度和爱尔兰这样的落后国家,其命运与资本主义本身息息相关。落后国家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在两种情况必居其一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并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二是落后国家通过斗争战胜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摆脱其枷锁。简而言之,落后国家的自由和解放是要以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为前提的。

阿伦·盖尔(Arran Gare)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必然趋势——将市场扩展到其他国家,直到整个世界被市场所支配。其结果是一个全球剥削体系,核心生产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权力增大并利用这一权力控制和剥削外围经济体。这些外围经济体沦为‘采掘经济体’,通过出口其矿物和破坏其生态系统来‘发展’,从而变得越来越弱和更容易受到剥削。”<sup>[8]</sup>这充分说明,像马克思那样将落后国家的解放问题置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之中,在今天依然是有效和必要的。同时,如果不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核心生产经济体及其全球剥削体系,落后的外围经济体就

不可能得到解放。

另一方面,落后国家的发展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并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使它有可能“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sup>[1](P828-829)</sup>。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又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sup>[1](P728)</sup>以上论述表明,俄国的发展都绕不开资本主义,它要么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而欣欣向荣,要么遭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波折而艰难前行。

正如列宁所说,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共产主义及其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sup>[9]</sup>。落后国家的自由和解放以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为前提,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的发展就必须独立和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相反,落后国家的发展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一个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因为“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sup>[10](P83-84)</sup>。<sup>①</sup>

的确,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过,“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坚持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那将会使他受到“过多的侮辱”<sup>[1](P730)</sup>。其实,马克思在这里表达的并不是他晚年的新发现,而是其一贯的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论》里的好几个

地方都以古代罗马无产者为例说明了“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sup>[1](P730)</sup>。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述过“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跨越式发展<sup>[3](P205)</sup>。然而,包括这种跨越式发展在内的特殊发展情形并没有否定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史过程;相反,特殊的发展必然内在于这种自然史过程之中。这是因为,无论其具体的发展过程如何特殊,它们依然要么是奴隶制生产方式<sup>[1](P730)</sup>,要么是封建组织形式<sup>[3](P205)</sup>,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sup>[1](P730)</sup>,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自然史过程的不同环节。可见,致使马克思遭受“侮辱”的,是那种对任何环境中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认定,而不是对落后国家发展必须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基础的坚持。

## 二、“卡夫丁峡谷”问题与落后国家的双重困境

如上所述,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世界视域和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中探讨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意味着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抵达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的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是因为它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保存着农村公社;二是因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农村公社有可能“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sup>[1](P828-829)</sup>。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当时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得以保证<sup>[1](P832)</sup>,并成为新社会的支点<sup>[1](P840)</sup>;其二,共产主义运动在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或者说,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并向俄国提供无私的国际主义

援助,以便俄国可以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然而,历史进程表明,这两个前提条件都没有成为现实,俄国因此也没有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基于大量的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然在俄国占据统治地位,且俄国已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指认<sup>[11](PVI)</sup>,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sup>②</sup>

事实上,无论俄国是否能够通过革命保证其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只要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同时取得胜利,并对俄国提供国际主义援助使之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俄国就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以说,在1858年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由于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sup>[12](P166)</sup>这一“困难的问题”的揭示已经预示了,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同时取得胜利和没有提供无私援助的前提条件下,俄国注定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而言之,没有这一先决条件,不仅俄国不可能,其他所有落后国家都不可能实现跨越。这也是阿伦·盖尔当今仍然在探究这一难题的原因。“如果是一个特定的共同体,无论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大陆克服了雇佣劳动制度,它又将如何生存?”<sup>[8]</sup>

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意味着落后国家必然陷入双重困境。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落后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不仅“现代的灾难”而且“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都在压迫着落后国家;不仅“活人”而且“死人”都在使落后国家的人民受苦<sup>[10](P82-83)</sup>。其实,列宁不仅承认和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认识到了俄国“很多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对俄国资本主义的阻碍。因此,就像马克思一样,列宁也认为,

俄国“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够发达”<sup>[11](PVI)</sup>。

一方面,落后国家必然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般而言,由于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落后国家便不得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于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落后国家内部要完成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转化为“资本”而人民群众则要经历转化为自由的“雇佣工人”和“劳动贫民”的两极分化的苦难<sup>[10](P297)</sup>。与此同时,处于帝国主义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环境之中,落后国家也不得不经受来自其他外部的资本主义苦难。马克思在论述原始积累时指出,美洲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东印度被“征服和掠夺”、非洲黑人被“商业性地猎获”,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sup>[10](P296)</sup>。然而,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征服和奴役并非只是其原始积累的表现。乌特萨·帕特奈克(Utsa Patnaik)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在《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一文中所说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给外围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收入紧缩”<sup>[13]</sup>,以及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21世纪的帝国主义》一文中所说的当代资本主义凭借“民族压迫”和“全球劳动力套利”掠夺“新兴国家”,由此造成“北方的资本家剥削南方的活劳动”<sup>[2]</sup>,都是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在征服和奴役落后国家并使之遭受现代灾难的明证。

另一方面,落后国家还必然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达。落后国家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不得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用马克思、恩



格斯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一是对于过去,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并且“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sup>[3](P402-403)</sup>;二是面向未来,它将“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并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sup>[10](P511)</sup>。为了赢得资本主义这种革命性的作用,落后国家不得不付出遭受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极端苦难的代价。但是,恰恰因为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尚不发达,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作用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以致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死人”还在“抓住活人”<sup>[10](P83)</sup>,落后国家又不得不艰难承受着资本主义生产尚不发达的苦难。

### 三、全球联合:落后国家的解放之路

落后国家之所以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因此陷入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困境,关键在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能够同时取得胜利。因此,要想从这种双重困境中解放出来,其现实的可行路径只能是整体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论述了无产阶级将自己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从主观上讲,无产阶级不仅对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一切生活条件极度非人性化产生了愤慨,而且在理论上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对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及其外观予以彻底剥夺,由此导致无产阶级“失去自己”<sup>[14](P261)</sup>。从客观上讲,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和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而雇佣劳动又完全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然而,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

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sup>[3](P412)</sup>。质言之,工人的自相竞争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则是其将自己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必由之路。

由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都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以便从中解放自己的革命联合,必然意味着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区域之内的工人联合起来,甚至意指超越单一国家或民族的范围而形成的国际性和世界性的工人联合。实际上,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了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联合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sup>[14](P273)</sup>。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sup>[3](P419)</sup>。如果恰如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所说,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给外围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收入紧缩,或者,恰如苏万迪所说,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特点在于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者的剥削和统治,那就越发明证,在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全球劳动者的联合是落后国家整体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进而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

然而,尽管大工业的发展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非人性的愤慨和理论认识为其革命联合创造了主观条件,但由于历史演变的复杂性和资产阶级的有意操控,要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则是十分困难的。令人惊叹的是,马克思在1870年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的信中就十分敏锐地指出了这种困难及其原因。马克思指出,爱尔兰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力市场提供过剩人口,因而压低了英国工人

阶级的工资,使其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于是,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并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份子而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偏见,而爱尔兰人则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并加倍地报复他们,以至于英国工人阶级分裂成“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在这种对立中,英国无产者“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可见,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的对立是英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也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而资本家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sup>[12](P328)</sup>。简言之,资产阶级有意制造统治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与被统治的落后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难以形成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得以维系的根本原因。

约翰·史密斯指出,当今新帝国主义阶段的利润并非源于任何形式的垄断,而是源于帝国主义超级剥削,即全球生产向低工资国家转移并使之普遍存在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剥削率,从而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各种各样的服务提供商及其雇员都能够共同分享超级剥削的战利品,并被打上“寄生的烙印”<sup>[2]</sup>。因坦·苏万迪同样指出,当今的全球资本正在努力通过塑造全球产业后备军来对全球的劳动者进行分而治之<sup>[4]</sup>。这使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惊叹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所具有的历史穿透力,似乎1870年的马克思早已预见到21世纪资本主义的做法。用今天的流行词汇来说,正是资产阶级在有意制造全球无产阶级的“内卷”,以阻止全球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

因此,探讨全球无产阶级联合的路径是当务之急。针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分裂成英国无

产者与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的情况,马克思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要“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这应当成为“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sup>[12](P329)</sup>。约翰·史密斯也曾说,尽管北方国家工人消费的商品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南方国家低工资工人生产的,也正是南方国家工人的生产率及其工资在根本上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水平与剥削率,但“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也面临着贫困境况”。因此,为了确保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当今新帝国主义阶段第一受害者的南方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一道埋葬资本主义<sup>[2]</sup>。

以此看来,在当今北方资本掠夺南方活劳动的全球化时代,为了开创全球无产阶级的联合路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竭尽全力地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从外面灌输给工人”<sup>[15]</sup>的工作:一是唤醒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南方国家的民族解放其实是他们自己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二是唤醒南方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尽管他们是当今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受害者,但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其实也是受害者;三是唤醒南方和北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南方和北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方能埋葬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从而也解放他们自己。唯有通过这样的唤醒,全球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才能真正实现。

### [注释]

- ① 李百玲指出,马克思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中的“大体说来”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参见李百玲:《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②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是持有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种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使他的理论免于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参见俞良早. 马克思在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2):4-11)。为了避免以后的被动就模棱两可,这不是谨慎理智而是不负责任,这样的人肯定不是马克思。与之相反,马克思的态度是明确而又负责任的:条件具备,就可以跨越;条件不具备,就不能跨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Smith J.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Monthly Review,2015,67(03):82-97.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Suwandi I. Behind the veil of globalization[J]. Monthly Review,2015,67(03):37-53.

[5] Pradella L.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Marx's capital[J]. Historical Materialism,2013,21(02):117-147.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08.

[7] 马克思.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A]//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07.

[8] Gare A. Marxism and the problem of creating a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vilization in China[J]. 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2008,19(01):5-26.

[9] 列宁. 列宁选集(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6-187.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列宁. 列宁全集(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Patnaik U, Patnaik P. Imperi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J]. Monthly Review,2015,7-8(03):68-81.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列宁. 列宁选集(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3.